

故事遗产学的分类理论

——兼评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和《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

董晓萍

内容提要:故事遗产学的基础是故事学,是故事学提出的分类方法和文化内部故事文本的清单编纂法。故事遗产学的差别则在于,要对世界他国和未来社会讲故事,要用故事遗产演绎整个人类遗产对于地球生命和地球环境的互动价值,因此更要求一种形态学上的高明成果;要求在故事历史内涵的解释上做到简单的不简单,还要求在各国各民族多元文化的相互共享与尊重上,拿出特色更鲜明、兼容性更强的表述框架。闻名于世的普罗普著作《故事形态学》和《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可以充任两者的桥梁。在今天的故事遗产保护讨论中,也可以对他提出的人文分类原则、历史内涵阐释和研究型故事叙事建模,做适当的反思与吸收。

关键词:普罗普 故事学 故事遗产学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

在人类精神遗产中,故事是一种天才遗产。研究它的故事学,以分类理论为核心,在整个20世纪中,成为各国故事学说的基石。它的经典著作的作者,如芬兰的阿尔奈,俄国的普罗普和巴赫金,法国的列维-斯特劳斯,英国的杜德桥,美国的汤普森、洛德和阿兰·邓迪斯,日本的柳田国男,以及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等,皆举世闻名,并在与故事学相关的文化史、社会史、语言史和精神世界史等领域的研究中,也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

近年世界上人类遗产学兴起,随之需要建立故事遗产学。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和中国政府通过的世界“四遗产”保护公约后,故事遗产学的建立,将促使所有遗产地人民和外来参观者热爱多元的民族历史文化,保护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这份伟大赠予。

故事学与故事遗产学是有紧密联系的,故事学所提出的分类方法和文化内部故事文本的清单编纂法,是故事遗产学的基础。故事学与

故事遗产学的差别就在于,故事遗产学的志向更大,要对世界他国和未来社会讲故事,要用故事遗产演绎整个人类遗产对于地球生命和地球环境的互动价值,而不是仅仅为一己生存、文化内部规则和现实逗乐去讲述。因此,它更要求一种形态学上的高明成果;更要求在故事历史内涵的解释上,做到简单的不简单;更要求在各国各民族多元文化的相互共享与尊重上,拿出特色更鲜明、兼容性更强的表述框架。从这一层上说,故事遗产学的建设,要求具备三个条件:人文分类原则、历史文化内涵和研究型的故事叙事建模。

在20世纪的故事学研究中,有的学者在这两者之间起到了过渡作用,如普罗普。他的《故事形态学》和《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堪称这方面的扛鼎之作。要说这两本书都是20世纪上半叶的老书,去时较远,距时下讨论的遗产保护一事也远。但是,他在书中提出的理论和工作方法,却显示了跨时空的力量。他本来研究俄

国故事,却有列维—斯特劳斯、阿兰·邓迪斯这样的对手,也有中国文化艺术科学界的广大关注者,他是被国际化程度最高的故事学者之一。不管他当初想还是没想,他早年构建的学问和后来不断被揭示的价值,都使他在同时代、同级别的领军人物中,与故事遗产学的目标更为接近。所以,现在我们还更需要他。近期中华书局出版的、贾放翻译的这两本书的中译本,一经面世便热销,也能说明其现代需求。

《故事形态学》,1928年出版,共十章,分别阐述了故事的问题的历史、故事研究的方法与材料、故事角色的功能、功能项所具有的双重形态意义和几种情况、故事的其他成分、根据角色所排列的功能项、新角色进入行为过程的方式、角色标志及其意义和故事的整体研究方法。首有俄国民间文学家涅赫留多夫序,末附附录,含作者对所用资料、符号和编号的介绍与多年后反思个人研究的文章,共8种,另有故事分析表1种,对读者了解和把握普罗普故事形态学的原创理论大有帮助。

《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共十章,阐释了故事的前提和开场,对神秘的树林、大房子、神奇的赠物、渡越、火焰河畔、远走天涯和未婚妻等母题做了精深分析,同时继续发展了作者的故事整体研究思想,提出故事的母题形态、民族志历史和表达方式是不可拆分的。首有作者初版序和第二版序,末附文献目录,是《故事形态学》的续作。

以下,拟从学界尚未涉及的故事遗产学的角度,谈谈普罗普这两本书的价值。

一、故事遗产学目标下的普罗普故事学

普罗普的时代是故事学的时代。在他的时代,故事主要被视为集体性的民间叙事类作品。

学者的研究对象,是此类资料学和根据故事文本编纂的母题清单。在此基础上,建设故事学的分类理论。其中名气最大的有两个:一是AT分类法、一是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它们自问世以来,都曾被一再革命,但总的说,故事学者的方向还是大体一致的,就是坚持民

俗志的保守立场,站在经验论的起点上,搜集和解释故事。大多数人还认为,故事学的性质虽然是描述的,但对故事的分类是一项理论性的工作。学者最终会按照不同的研究专题,设定不同的分类目标,使用不同的分析方法,建成不同的故事专题的资料系统和解释系统。这些工作还要符合文化内部的社会上下文,证明在文化内部进行故事超时间传承的最大可能性,于是,学者还要反复强调故事流传的基层社会性、广泛群众性和家族或地方文化圈的最简化再生能力,而避免对故事的天才特点和学者的历史透视能力做任何介入,也避免做研究型的故事形式建模。在全球化到来之前,这种故事学的贡献是占主导地位的。

普罗普也正是在这种研究框架中遭到非议的。其实读者看他的中译本就知道,他从不曾忽略资料学,他还是最早一批发现故事资料中的类型性和做母题清单的人。但是,与众不同的是,他还有选择地对故事篇目和母题做了分析和标注,运用某些类型的人物、事件、地点、需求和内码研究故事,也对该母题做不同历史和不同地区的比较,以免过分强调文本上的实证,忽略了掩藏在故事背后的人们的情感、审美特征和风俗制度。总之,他最早发现了故事的天才遗产秘密,并宣布,“凭借这些我们的工作踏上了一条全新的道路”。除他之外,美国哈佛大学的帕里—洛德师徒还研究了故事传承的天才人物。但也如读者所知道的,这种十分超前的研究都要遇到后来的时机,才能爆发出耀眼的闪光,而在同时代却可能饱受委屈。对此,普罗普的同行叶列米纳也做过评价:“弗·雅·普罗普的著作从来不曾被单一地接受,人们总是对它们议论纷纭,它们有拥护者也有反对者,但任何时候任何人都不会漠然置之。弗·雅·普罗普的著作激发着创造性的思想,人们不断回到这些著作上来,并且还会有后代学者来此长久地流连。”今天,我们却需要普罗普的时间差。在建设故事遗产学的时候,我们需要对他提前看到的问题做反思。

(一)故事的人文分类原则

现在的学者已经有了这个条件。在进入全球化和现代化后,故事研究的转型问题已经摆上了桌面。具体到中国而言,这是由三个新需求造成的:一是在中国全面开始现代化进程和受到全球化冲击之前,开展了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程,积累了海量故事信息,使用了计算机贮存办法,于是开始强调故事的人文分类原则;二是在中国对外开放后,进入了世界多元文化交流体系,于是对故事的简约表达形式更为需求;三是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下,要求有历史与未来的接续性,于是利用故事遗产的历史内涵和祖先文化认同,建设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更受重视。钟敬文曾概括说,“我参加了全国性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三套集成是文化部全国艺术规划小组所主持的民族传统艺术、文学集成、志书的一部分,该丛书为国家重点科学规划项目之一)的搜集和编纂工作。三套集成,工程巨大,动手于1984年,至今历时十余载。各省编成并陆续出版的已有十多卷,其余的也在编审中。它们的出版,颇引起世界学术界的注意。在这项工程中,我担任了全编委会的常务副主编兼故事卷的主编。在决定编辑计划、原则及具体审定省、市卷上,个人颇费时间、脑力。但它同时也增进了自己的专业实际知识,使我更加熟悉编辑事务的各项问题。这不仅对今后这方面的工作有利,而且对我整个民俗学理论的发展也是富有益处的。”他谈到了重新思考故事学的新优势。

仍然不能忽视的是,在现代开放社会,故事的讲述环境和故事的传承人群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与故事学的封闭时代已大不相同。现在的故事研究动力、功能和理论建构,只转向故事遗产学。因此,今天出版普罗普的著作,就不是一般地借力,而是要指出他的学说已经延伸到故事遗产学的范围的部分,开发其能产生的作用。

现代学者研究故事,要面对三个问题,即口头资料与书面文献的对照使用问题、故事传承人群的变迁问题和故事与仪式的关系问题,否则就不能建立对现代搜集故事资料的人文分类

原则。以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为例,贮存和研究其口头资料,需要利用书面文献,包括地方志和地方人士的历史和民俗著述。但这些文献不一定是对口头故事的直接记录,很可能是受限于地方精英的文化观念,也可能是在现代社会搜集故事的过程中,根据书面史料复制的资料,或搜集人按照现代民俗志的文本提供的新资料,它们肯定都不是主流,但它们的存在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然而,不管怎样,观察这些资料的方法,还是一个口头资料与书面文献的关系问题,表现了地方精英对故事资料在保存和传播上的表现方式,包括:如何改造?如何使之书面化、正统化或学术化?如何将之纳入文献系统?故事自身的再生与家族或地方文化圈有着怎样的互动?一些中介传承者,如艺人、歌手、居士、住持、巫师和风水先生等,如何利用自己的娴熟技艺和在老百姓中博学的优势,从事文化经营和经济经营?他们如何灵活地学习和利用自己的业务使自己变得更有名、事业发达或经济发财,还是他们将三者目标混合利用?如何从这种书面文献和文献传承人与故事关系的调查中,证明故事的活态?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这时回首普罗普,就发现他作为内行的厉害。他承认,这些问题解决起来颇为复杂,但这也要求学者用科学分析的方法揭示故事的性质及其发展。科学的任务,不在于发现某些“相应之点”,而在于判定故事本身的思想,这就要求学者对故事的全部记录本和各种异文加以分析研究后再做判定。他的精彩观点是,故事是人民和风俗社会所处的发展程度的工具,而不是学者的工具。他的两本书都是在说他如何把故事当人民风俗的工具做处理的。

在对待故事资料的变迁上,他提倡找到历史和地方环境中的文化烙印。他从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去看这些资料,便能发现它们原来的实际生态面貌;再从社会发展主义的立场去看这些资料,便能发现它们的适应变迁部分。他又在两本书中,把母题当作象征符号,确定使用两个立场的接合点。

在对待故事传承人群的变迁上,他的观点

对我们也有启示。由于时代的限制,我们看不到普罗普使用田野作业资料,他毕竟不是马林诺夫斯基。但他也不是弗雷泽那样的书呆子,他批评“民俗学家常常引用故事,但常常并不了解它。”他当时采用的唯物主义立场要求他始终关心传承人的社会地位变迁问题。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故事传承人的身份是很不稳定的。在有些传承人手里,如艺人师傅、寺庙住持,故事资料还具有专业性、秘传性,是显示传承人身份和权威的证明。在农业社会文化中,是很重视传承人的身份地位的,我们现在要通过考察这些传承人如何取得现在的身份和地位,来建立活的传承史;还要通过考察传承人与村落、社区、地方社会、本地和外地寺庙的关系,补充人民的生活史和精神史。

普罗普的研究是长时段的,包括不适合做田野作业的过去历史阶段,但他提出的是一个根本问题,即不论传承人怎样变迁,其故事都要与广大共享者有不可或缺的社会文化联系,因此,对传承人的保存资料,不能做孤立观察和解释。他在两本书的最后一章都提出把“故事作为一个整体”研究的思想,是一种很深刻的原则性提法。

在对待故事与仪式的关系上,现代学者还是踩着普罗普的点儿走的。他最早在《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中提出了“故事与仪式”的命题,做出了故事对仪式的正用和反用的天才发现,还揭示了故事和仪式是一套民间宇宙观中叙事的规律。读他的书,我们能认识到,在这个宇宙观的笼罩之内,师傅、班主、风水、住持、巫师与人民的观念和行彼此是“认同”的,被表演的故事形象因此具有“真实性”,人民还能随之“认同”禁忌和理解禁忌中的生命观和世界观,使神祭仪式与人民认同以对立统一的方式,建构一种文化逻辑。他的这些分析,能帮助我们扩大对宗教和故事的不同说法的资料的注意力,启发我们从双调情节和二元状态的角度考察故事。我甚至想说,巴赫金的复调观和列维—斯特劳斯的二元结构立场,恐怕都是从这里衍生的。

普罗普在上述研究中,对故事的分类原则,从故事性质、故事关系和故事的二元结构上,都提出了新命题。这就比 AT 的单纯故事母题分类要深刻得多,是一种将故事母题、社会关系和文化结构逻辑作为整体的人文分类原则,因此它能在现代社会的故事遗产学分类中被派上用场。

二 故事的历史文化内涵

普罗普在《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中就集中讨论了故事的历史文化内涵,这对现在建设故事遗产学来说也是少见的贡献。

就故事学而言,从 19 世纪开始,直到 20 世纪二战前,都是强调故事的“时间意义”或“历史意义”的,但又缺少对故事的文化空间的主体的认识,结果导向了非历史主义的研究。二战后,从普罗普起到列维—斯特劳,都开始对故事中的社会历史、地理环境、民族民俗、语言和生活加以关注,都在各自的著作中阐释故事的形式和内涵的关系,这就给了故事学以新的学术价值。

从中国的情况看,进入现代社会和全球化以来,尝试重建故事的历史文化内涵,所遇到的问题是:故事资料考证的正确性。这方面的具体问题有:原有故事记录地点与现代社会的传承地点是否重迭?现有故事文本与地方民俗传统是否重迭?故事传承在不同历史时期是否有不同的传承人和传承派别的区别?以及如何把历史解释朝着理论方向去构建等。

此时反思普罗普的意义有三。

第一,考察风俗制度的内涵。普罗普提出,经过考察故事的开头、发展、结尾全部叙事环节发现,决定故事的情节结构的顺序方向的,不是历史本身的事实,而是风俗制度。当然,他当时尽量使用马克思主义的词汇,并受到直线进化论的影响,在表述上,有庸俗社会学的痕迹。但我们阅读他的全书,就能知道他到底想说什么,也明白我们应该吸收什么。再看看列维—斯特劳后来对风俗问题的强调,也能明白普罗普曾用风俗解释故事的历史内涵是何等成色的亮点。对我们来说,这能帮助我们思考故事

的记录地点与现代社会传承地点的重迭或不重迭的复杂问题,给予细致的考察与分析。

第二,考察人生仪礼的内涵。这是根纳普提出的问题,几乎所有故事学家都用得鲜活,特别是在揭示故事历史内涵上发挥了妙用。普罗普在确定了故事结构的标准后,在研究故事的技巧特征时,撇开了母题形式的多种变幻的迷惑,去解释故事叙事的各个细节的历史文献结构多样性,解释技巧的全部词语后面的人的声音多样性,然后联系全部叙事过程,分析人生仪礼的顺序对故事的他界叙事和旅途叙事的影响,分辨出故事情节的较早形式和较晚的形式,再解释故事内涵的一些历史发展阶段。这就带领我们进入了一个故事的生活历史。

第三,考察物质文化的内涵。早期人类学和故事学都强调精神史,到了普罗普的时代强调生产方式“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他也是在这个话语系统中工作的。但他发现,单纯找故事与物质的联系是不能对应的,不能由此破译“历史往昔”的概念。他的功劳是在当年十分含蓄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到后来,从葛朗西、列维-斯特劳斯,到鲍辛格,又经过了几代人的努力,才逐步解决了物质文化对于重建故事历史内涵的复杂意义。今天世界上要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就吸收了这些思想巨匠的成果。

普罗普将故事历史内涵研究与人类社会的历史内涵研究是严格区别开来的。他一再强调,这是故事,不是社会;这是文艺,不是事实。但他要强调的是,故事的精神释放能量是极大的,其历史内涵的组合具有神奇的一致性和惊人的不可拆分性,因此,学者看故事,只能是匆匆的一瞥。学者所要做的,是对故事做特殊的、深入的研究。他知道这件事很难,但他终于成为开路者。他说:“在此要对一直被认为是难以解释的现象,即全世界民间文学情节相似的现象作出历史主义的解释。这种相似要比肉眼所看到的普遍得多也深刻得多。无论是迁移理论,还是人类学派提出的人类心理同一性理论,都未能解答这个问题。问题的解答要靠将民间

文学与物质生活联系起来进行历史主义的研究。”读者能看到,普罗普对自己的付出和发现是很自信的。

三、故事的研究型叙事建模

普罗普的一个广为传颂的工作是选择一百个有代表性的故事,做了一种研究型的叙事序列建模。今天,我们要建设故事遗产学,就要思考他的基础工作。

他通过研究100个俄国神奇故事发现,从前故事学都是按照“中心角色”分类的,但这种分类在使用中不能统一贯彻,还会删除故事的很多人文属性,不利于研究。他就在大量研究的基础上,自己建立了一个故事叙事模式,这就是广大读者早有耳闻的功能结构序列模式,译者贾放将之谨慎地译为“功能项”公式。

对模式的内容就不细说了,读者可去看他的《故事形态学》。这里要讲的是这个80年前发明的模型,与近年已经开始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计算机处理工作,两者之间不期而遇的关系。主要有两点:

第一,通过专业研究,建立简要的中国故事叙事模型,其价值的存在,在世界多元文化交流中,已经开始体现;

第二,在AT分类已经被方便地使用,的情况下,考虑吸收普罗普式的,整合母题、历史内涵与叙事序列的表达式,把文本写句与民族志文化逻辑相结合,对故事遗产的现代传播,对建设民族主体文化,对数字化,对未来社会,都有意义。当然,对他来说,当年是把故事资料经过上述的几道“冷处理”,建成整体资料系统,并产生相关理论。

二、在故事遗产学建设中对普罗普的其他借鉴

第一,多学科综合研究。俄国学者普济洛夫说,普罗普有“罕见的博学、文字功力、在几门学科中运转自如、对方法论角度和对理论问题的一贯关注,这些都渗透在他的全部工作中,并使得作为民间文艺学家的普罗普的活动不同凡响”^⑩。

第二,做相关学术史的理论对话。故事学

者要求耐心、细致、有条理、有规范地整理资料，同时又能对故事对象进行实际地思考，磨炼一种接受资料和处理资料的坚持心态。但更重要的是做学术史的理论对话，像列维—斯特劳斯、阿兰·邓迪斯与普罗普的对话等。这样才能避免过度诠释，又能继承创新。

第三，迄今为止，AT分类法的地位还没有被彻底动摇，原因是后起的许多方法还都不具备AT的广泛涵盖力和普遍适用性，也没有AT那么简便易行。普罗普的方法也如此。所以，我们今天重读普罗普，还要根据现代知识理论系统和现代民间文艺学的研究目标实际去做消化吸收。

普罗普的书，毕竟写于故事学的时代，我们今天谈他对故事遗产学的启发，也还是有限度的。但他的理论和方法的确有相当的超前性，正如当代俄国著名民间文艺学家梅列金斯金所说的，他“在某些方面远远走在了自己时代的前面，只有在结构分析方法深入语文学科和人类学学科之后，普罗普科学发现的绝对范围才变得昭然若揭”^⑫。在列维—斯特劳斯的眼里，普罗普是真正意义上的故事学天才，“如此丰富的直觉，它们的洞察力——它们的预见性——令我们赞叹不已，为普罗普赢得了所有那些并不认识他的追随者的忠诚……即使我们详述某种保留意见并且提出一些异议，这些意见也决不会削弱普罗普的重大功绩，也决不可能剥夺他的最先发现权。”^⑬

总之，终究是普罗普和普罗普们，才把故事的天才遗产挖了宝，做成了大学问，仅此也该纪

念。

注释：

钟敬文：《建立新民间文艺学的一些设想》，原文写于1983年，首刊于《民间文学论坛》1983年第3期，收入钟敬文《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钟敬文在此文中，系统阐述了建立民间文艺学（以故事学为主）的资料学和分类理论的价值，指出：“对民间文艺学来说，资料不仅具有一般的重要性，而且还有种种特殊问题。我们的资料主要是要通过‘田野作业’去获得的，而现在这种工作，还需要大力去进行。有了记录，还有分类、档案保存等问题。在这一系列的活动里，要得到比较理想的结果，就必须及时总结经验，并不断进行研究。如果资料是历史上的，那还要做搜罗文献‘辨别真伪、考订事实’的一连串工作。总起来说，在民间文艺学活动上，资料学必须占一个相当地位。忽视了这点，我们的科研成果，就要受到一定的损失。”参见原著第21-22页。

〔俄〕普罗普：《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贾放译，第5页，中华书局2006年版。

同，封底。

钟敬文：《我与中国民俗学》，原载张世林主编《学林春秋——著名学者自序集》，中华书局1998年版。收入钟敬文《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第115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同，第15页。

同，第472页。

同，第465页。

〔俄〕普罗普：《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第一章前提4. 故事作为一种具有上层建筑性质的现象》，贾放译，第7-8页，中华书局2006年版。

同，第476页。

同，第209页。

⑪ 同，封底。

⑫ 同，封底。

⑬ 同，封底。

【责任编辑：高荷红】